

这是我的选择

文 / 一位在港多年的内地生

刚从金钟回来。走到添马公园，朋友说，这大草坪，多好。

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陆的朋友，或者在香港的大陆朋友，快要走到关系尽头。他们不是脑残，也不是白痴，他们是大陆或香港或外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、博士，教育背景很好，专业遍涉文理工农社科医法。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是很好的，只是对这一两年在香港发生的事，和我的看法、感受越来越不同。我没有和他们绝交，但我知道，有些选择注定此生不同。

我一直在想这是为甚么，我尝试回忆他们谈论这些时候的言语措辞、表情语气：

怀疑虚无的说：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方难免一叶障目，谁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争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。蓝图有很多种，民主未必是好的。

深谋远虑的说：我尊重他们在做的事，但这样在策略上是无效的，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。

利益考量的说：经济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，香港没有筹码，在地缘政治上，世界局势上，它都是弱者。（好像一切不义的事情在这里都应该被默许，因为它是弹丸之地）

没有人喜欢被揭短，尤其当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短。当他们离开中国大陆，总

被人问，你知道六四吗？一连串名字、事件抛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善意的疑问。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挑衅，对他们判断力的挑衅，智力的挑衅，于是年轻的知识精英们对此非常鄙夷。他们会自信的说，我的国家很好。内心的不确定和空虚，也会化为一种愤怒：你凭什么站在道德高地上，用这样的优越感质问我？！

大陆人对苦难是有共鸣和感情的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屁大点事就闹的地方，很看不惯。同样都是人，我们一直这样生活也没见怎么样，你凭什么。我们有地沟油、毒奶粉，我们还是长大了；我们小学戴红领巾，大学考毛邓马，写的文章、做的杂志也比你们强，拿到外国名校 offer 的也比你们多，你们凭什么。文革过去也有杨绛、木心这样高贵的灵魂，极权国家反而有更丰富、优秀的作者。你们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，过着媚俗的生活。

他们觉得只有忍耐，深深的忍耐，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争取生存，博弈，有一天才有资格有资本和世界说不。他们说这条路很漫长，你们急什么。百年大计，岂容一时激进而毁于一旦。

去年，朱嘉明先生来中大，和卢思骅、张秀贤对话，题目是：关于理想的世代对话。他说，在欧洲教书这么多年，每次回到中国，那里的孩子总是那么沉重，没有欧洲年轻人的热情和轻松。（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热情和轻松，是在台湾）他说，你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政治迫害，没尝过饥饿的滋味，为甚么活得这么沉重，好像时刻在忧虑生存。如果父母吃过的所有苦，变得富裕了，是为了告诉孩子，你应该像我们一样隐忍，才能不再贫贱的活着，那真的太悲哀。

是，我们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老了。这样的印记太深太深，难以摆脱。他们说世界只认得那个成事者，于是他的手段也都是策略，变得正当。一个理想主义

的 loser 注定会后悔的。他们不相信没有经济保障，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，不相信正直、公益、不求回报。他们不能明白，西西这样的作家，许鞍华这样的名导演，也可以安于不买房子过着普通生活，他们不能明白，文人不做公知没有圈子，也可以活得很自在。因为确实没见过，见过也被骗过。

我想起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的结尾，面对进步的系统，无可逆转的时代，废纸打包工汉嘉最终把自己打包了：「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，我像塞内加一样，像苏格拉底一样，我选择了倒在我的压力机里，倒在我的地下室，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。虽然压板已在挤压我所在下巴底下的双腿和其他部位，我拒绝被赶出我的天堂，我在自己的地下室，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，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调离这里。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，我不由得呻吟起来，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。」

今天我的选择纯属个人选择，你甚至可以说它处于某种自私，它不是行动策略，没有想过要为大多数人的明天。但这是我的选择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我甚至不苛求你理解的选择。

明天很令人担心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但今夜，还是祝所有人晚安。